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

The Rol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Pursuing National Goals

美国生活的希望

[美] 赫伯特·D·克罗利 著
王军英 刘杰 王辉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国生活的希望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

赫伯特·D·克罗利著
王军英 刘杰 王辉译

[美] 赫伯特·D·克罗利 著
王军英 刘杰 王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
[美]克罗利著；王军英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8

ISBN 7-214-04424-2

I. 美... II. ①克... ②王... III. 政治-研究-美国-现代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6656 号

- 书 名 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
作 者 [美] 赫伯特·D·克罗利
译 者 王军英 刘杰 王辉
责任编辑 厉 玲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页 2
印 数 1—4000 册
字 数 31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424-2/D·664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美国生活的希望是什么?	1
第 二 章	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	25
第 三 章	民主党与辉格党	46
第 四 章	奴隶制度与美国民族	63
第 五 章	当代形势及其面临的问题	86
第 六 章	改革和改革者	117
第 七 章	重建:条件和目的	147
第 八 章	国家和民主	177
第 九 章	美国民主与国家原则	218
第 十 章	国家的外交政策	238
第十一章	重建的难题(一)	259
第十二章	重建的难题(二)	291
第十三章	结语——个体目的和国家目的	330

第一章 美国生活的希望是什么？

一、美国生活的希望

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如果不爱国，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伊米尔·雷奇先生^①在《国家的成功》一书中谈到：“美国人对他们的联邦政府充满了信心，坚信未来一定会成功。因此，多数美国人只接受正面的赞扬，而对其他言论充耳不闻。我们经常听到美国的公众演讲者质疑上帝与神是否真的存在，质疑基督教的历史性或真实性。然而，我们从未听到美国人质疑他们心中对美国未来的无比坚定的信念，也从未听到美国人称自己需要建立某种信念——因为对美国未来怀有无比坚定的信念是美国人最重要的信念。”雷奇先生强调美国人对未来怀有无比坚定信念的这种方式或许并不是十分的恰当，但是他这番话的主旨是真实的、正确的。美国人对国家的信念是虔诚的，即便不是十分强烈，至少

^① 伊米尔·雷奇博士(Emil Reich, 1854—1910)，历史学家、哲学家，出生于匈牙利，后居住在英国伦敦。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Imperialism*)、《历史上的外国人》(*The Foreigner in History*)、《国家的成功》(*Success Among Nations*)等。其中，《国家的成功》于1904年由纽约的哈泼兄弟(Harper & Brother)公司出版。此书主要讨论了促使西方世界各国在经济、民族、知识、宗教等方面取得成功的原因。(译者注)

是坚定的普遍的信任。这种信念无处不在,并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孩提时代我们就经常听到长辈们在交谈中谈及这些话题。我们接受的教育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这种信念就会愈加强烈。报纸、小说家、演说家和剧作家虽微不足道,但他们至少都是虔诚的真理传播者。对美国的未来持怀疑态度的人没有遭到人们的反驳,因为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这种信念——对美国未来的坚定信念作为一种模式化了的影响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它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或许会质疑并厌恶我们的同胞借国家之名所做的一切;然而,我们的国家本身、国家的民主体制和繁荣的未来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并不是只有美国人才拥有满腔的爱国热忱和美好的信念。英国人感谢上帝让他们生来就是英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这体现在英国人的教堂、酒馆和喜剧歌剧文化中。法国人宣称法国是最文明的现代国家,法国能够满足具有高社会智商的人的需求。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并没有引起其他国家人民的羡慕;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是神秘而荣耀的,他们将这种看法藏于心底而不向世人表露。这使“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与“美丽的法国”两个曾启蒙并引导世界的形象黯然失色。每个国家,因其民族的觉醒程度不同,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这种信念的影响。然而,大英帝国的一个英国人所怀有的信念与民主之乡的一个美国人所怀有的信念有着天壤之别。英国人头脑中的国家理念更趋于排外,唯我独尊,英国人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对大不列颠历史功绩的回顾与眷恋,因而英国人的爱国精神受到了约束和限制。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不只是专注于国家理想,他必然会更多地关注这个国家固有的国家体制和传统,关注国家的未来。的确,这种对国家体制和传统的忠诚意味着拥有一种重要的理念,然而英国人、德国人,甚至法国人的国家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本国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响。真正的爱国者必须忠于既定的制度和社会体制,保持理智行事的习惯——因为过早地摆脱历史的束缚将比顽固的保守主义更易使国家面临严重的危险。

法国是唯一通过革命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寻求继续向前发展、创造美好未来的欧洲国家。结果，法国的这一经验被欧洲其他国家奉为前车之鉴，而非借鉴的典范。

另一方面，美国人的爱国精神把对历史传统和习俗的忠诚与对一个理想的国家前景的设想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片神奇的充满机遇的土地，这个民主之乡吸引了更多满腔热情的人们到来。雨果·孟斯特堡教授^①在《美国人》中称：“将美国人与他的同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种族，也不是传统，更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他们共同创造的未来。”或许，这一代美国人对这种美好未来的设想不如前几代美国人所设想的那样清晰明朗；尽管人们十分清楚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障碍，但国家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希望之乡。他们依旧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会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虽然这种信念有些模糊、天真，没有任何依据，但这是我们国家理念的根基。过去应当对美国人有着更多的意义，而未来应当对欧洲人有着更多的意义。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生活不能像欧洲国家的生活那样与其稳固的历史生活根基割裂联系而不受任何影响。但是，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我们美国的历史有其自己的特点。它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历史短暂，而且从殖民者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一种观念就已经存在并指引着人们的生活。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期待并设想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个民主之乡从一开始就被描绘成希望之乡。所以，美国人对国家传统的忠诚肯定了关于美好未来的设想。如果美国不是一个希望之乡，没有受到美好未来设想和远大理想的引导，那么这个美国就不是先辈遗赠给我们的美国。怀着国家将拥有美好未来的希望，美国人遵循着国家的传统，而不是破坏国家的

^① 雨果·孟斯特堡(Hugo Münsterberg, 1863—1916)，德国心理学家，获哲学博士学位、医学博士学位。出生于波兰但泽，居住在德国。在莱比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南部城市)期间师从冯特(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1892年离开德国前往哈佛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此后一直在哈佛大学工作。有关美国的著述主要有《美国特色与美国人》。(译者注)

传统。

然而,当美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希望之乡时,人们也许会纳闷希望之乡的确切含义是什么?通常,它的含义是,无论对个人而言,还是对集体而言,未来能够比过去或现在使一切变得更美好。但是,极其肤浅的分析会使希望之乡的含义变得含糊不清。这种更美好的未来将给美国公民个人或整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呢?这个希望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希望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自我实现,还是意味着需要人们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如果意味着责任,那么这些责任又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个年轻人的事业有前途,这指的是他自身的能力与遇到的机遇极可能使他变得富有,使他成名,或使他极具影响力。当然,这个判断并不意味着任何责任。这仅仅是基于个人过去的表现和已经证明了的个人品质作出的预测。在外人看来,事业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但对年轻人自身而言,事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他而言,美好的未来绝不会凭空实现。他必须努力付出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而这一切很可能又会因为一些无法预见的困难、自身的弱点或一些严重的错误抉择而毁于一旦。同样,美国生活的希望也是如此。从一个移民的角度来看,这种希望可能是对一个美好未来的期望,只要在美国落户,他就能够享受这一切;然而,一旦他成为一名美国人,这种希望将不再只是一个期望。这种希望将变成一种责任,这个希望的实现要依靠他自己和他的美国同胞们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我们阐述美国生活的希望时,必须说明实现这种美好未来需要付出的努力。

前面提到美国作为希望之乡的两个方面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区别常常被普通的美国爱国者忽视了。对于他个人、他的孩子和其他美国人而言,美好的未来是满怀信心的一种期待。他看待这一切就如同一个友好的局外人看待那些有前途的人的事业一样;他认为美好的未来肯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自我实现;他称自己的国家不仅是希望之乡,而且是命运之乡。美好的未来始于辉煌的、成功的事业,而事业发展的强劲势头则预示着繁荣的景象将永远持续下去。正如赫伯特·乔

治·威尔斯^①先生在《美国的未来》中所说的：“一个人如果与一个美国人谈论国家目标，那么这个美国人可能会对此感到困惑；如果谈论国家命运，那么这个美国人肯定会积极地作出回应。”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以“美国生活的希望”为主题的书中能够详尽地描绘美国辉煌的未来——一个现代的乌托邦坐落在美好之乡，上空飘扬着星条旗。他们口头上可能会承认美国辉煌的未来意味着人们要担负起一定的责任，但他们不会对承担责任感到吃惊或新奇。我们的先辈已经担负起了这些责任，我们的后继者将继续担负起这些责任。因为美国的光荣历史预示着美国将拥有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们的国家职责仍将是继续保持传统的行为方式、遵循传统的标准、奉行传统的理念。为了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美好的前景，我们美国人所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努力工作——继续坚定不移地、愉快地沿着既定的道路走下去。

那些希望此书成为爱国预言集的读者们可能会对此感到失望。我不是一个文字预言大师，而且我本人极其厌恶前面所述的乐观主义、宿命主义和保守主义三者混为一谈。如果固守这种观念——美国的美好未来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自我实现；美好的未来是我们的社会状况、体制和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美国生活将失去任何希望。如果没有一种观念能够在某些方面将人们从过去历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美国人勾勒的美好未来将变成空谈。美国历史上有很多值得自豪和庆贺的史实，同时也有很多令人感到懊悔和羞愧的过去。总的来说，忠实的美国人没有理由为过去感到羞愧，因为自始至终这一切都是由人们创造的，而不是凭借对美好未来的设想实现的。今天的美国人和明天的美国人必须遵循这种传统的观点。他必须做好准备随时为这种传统的观点，甚至是美国人实现理想的传统方式作出牺牲。我认为，这种牺牲必须要付出；如果没有任何付出，美国生活将逐渐失去它的希望。

①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简称 H. G. Wells, 1866—1946), 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 如《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1895)、《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 (1897) 等。1906 年威尔斯访问美国, 并于同年出版了《美国的未来》(*The Future in America*) 一书。威尔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三十多年之后的美国将发生什么变化, 并试图解答这个问题。(译者注)

任何个人生活或国家生活所能拥有的美好前景是一个由理念所决定的希望。这个希望的实现既非源自乐观的期望,也非源自墨守成规地效仿过去的功绩,而是源自勤劳的、诚实的、独具眼光的、不畏艰难与困苦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的美好前程不是源于实现一个具体的、有价值的目标,那么他的事业很快就会变成一味地对成功的追求;即使这种追求最终成功地实现了,不论它拥有多么美好的前程,最终都将被葬送在追逐成功的坟墓中,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希望只是寄托在对权力和成功的追逐,那么这种功利的追求最终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在道德的世界里,未来只是作为一个实现目标的工厂而存在着。欧洲的几个发达国家迫于历史条件的压力都制定了具体的目标;而美国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只是部分根源于历史。美国致力于实现它的民主理想;如果要使美国的希望得以实现,那么应做好准备沿着理想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不论这条道路将通向何方。

毫无疑问,美国人始终认为国家的未来是一个需要努力去实现理想,他们的期望充满了自信与自负,他们预言美国的未来不仅稳定、繁荣,而且会更加美好。通常,对个人和社会进步的理想需求与他们的爱国预言是共同存在着的。他们或许从未充分地意识到,实现这种更加美好的未来靠的不是社会自身的发展动力,而是详细的规划和艰辛的努力。无论如何,在寻求实现和强调美国国家希望的理想含义方面,我是忠实于广为大众接受的美国传统的。即使美国人忽视了这些理想的含义,即使他们认为更美好的未来意味着更多的福祉,理想的需求仍然客观存在着;如果这被确立为美国传统的一个主要方面,那么传统或许就改头换面了,但这是不会被推翻的。

此外,不管我们有多么不喜欢美国人的这种意向——认为国家希望的实现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持这种意向,这需要人们对它进行仔细而慎重的思考。它植根于美国生活中看得见的地方,植根于美国人民的实际经历。正如大家理解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家希望一直在国家发展动力的推动下逐步实现。如果基本情况一如既往保持不变,那么现在盛行的乐观主义、宿命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者的结合仍将是

解释这种情况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目前的情况下，美国国家生活范围内发生的变化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料到这种思想状态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些新出现的情况迫使美国人必须作出选择——国家希望是一个过程还是一种理念，然而，在对新出现的情况及其意义作出评论之前，我们必须审慎地研究早期美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和相关的观念和体制之间的关系。只有更好地理解广为大众接受的传统，分析其利弊及遇到的困难阻碍，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国生活希望的真正含义。

二、希望的实现

美国生活的种种情况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轻松的、慷慨的而又缺乏责任感的乐观主义。与欧洲人相比，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美国人提供了便利，如果没有大西洋和广袤的未开垦的荒地，美国绝不可能成为希望之乡。欧洲国家因受到客观生存环境的制约不得不事事谨慎小心，对未来也缺乏十足的信心，他们总是在为实现国家的安全和统一而战。一方面，他们面临着敌人可能会侵犯边境地区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们的家园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所以，他们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国家强大、人民团结，贯彻正确的方针政策，采取适宜的行动。法国的例子表明，不论是忽视国内人民的力量，还是无视促进人类进步的理念和构想，都将使国家处于危险的境地中。德国的俾斯麦^①和意大利的加富尔^②抓住机遇

①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人称铁血宰相。俾斯麦是19世纪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他在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战争统一了德国，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但最后由于同威廉二世不和最终下台。最初，作为一个保守的专制主义者，俾斯麦镇压了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民主运动。他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译者注)

② 卡米洛·本佐·加富尔(Count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1810—1861)，19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首相。1852年，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派著名代表人物，加富尔受命出任撒丁王国首相。执政期间他一直致力于意大利的统一运动，被称为意大利统一的总体设计师。(译者注)

分别在德国和意大利将理想主义与拿破仑三世实施的专制统治方式结合起来治理国家,尽管当时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这两者看上去毫不相关。大不列颠在这一方面比那些欧洲大陆国家拥有更便利的地理条件,大不列颠是一个岛屿国家,这使大不列颠能够避开外国政治的种种影响和威胁,使大不列颠能够自由地在国内实行适度的自由主义,在海外无限制地实行帝国主义统治。然而,大不列颠小心翼翼地利用着这种自由。大不列颠的自由主义只是针对大不列颠人民而言,大不列颠的和平也只是针对英属殖民地而言。大不列颠本可以比法国更好地将其国民生活与国家理想结合在一起。然而,大不列颠人真正相信的是大不列颠的安全、繁荣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就我们美国而言,英国拥有的各种优势条件在这里都得以放大。将美国与欧洲大陆隔开的是一个大洋而不是一个海峡,美国的领土面积相当于一个大洲的面积而不是一个岛屿的面积。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在极大程度上使我们不会遭到外敌入侵,而且只要敢于尝试,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实现我们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之前,这片土地尚未有人定居;在这里定居意味着将拥有广袤的土地和大量的经济机遇。独立战争结束后,政治组织和社会机构重新建立,这些组织和机构不仅行之有效地发挥其作用,而且变得更加灵活。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下,新世界注定将成为居民的一方乐土。这片乐土与欧洲大陆相比,能够向人们提供更平等的机遇和更美好的未来。

没有哪一本书能比《一个美国农民的信》更清楚地阐明了人们对希望之乡的最初理解和设想。这本书是由一位名叫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①的法裔移民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撰写的,书中详尽地阐述了

^① 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 1735—1813)出生在法国。1754年,克雷夫科尔移民到新世界,在纽约殖民地的一个农场定居。美国革命战争期间,他在双方都有朋友和亲戚,而且自己遭到英国人短期监禁。1780年他乘船前往欧洲,安排在伦敦出版他写美国生活的文章。1782年,他发表了十二篇文章,并将这些文章命名为《一个美国农民的信》。这本书出版后,作者一举成名,并为这个新生的国家赢得许多朋友。他曾担任法国驻纽约领事几年,1790年回到法国安度余生。克雷夫科尔对新世界敏锐而富于同情的描述,使他成为拥有广大读者的美洲评论员。他在《信》中还提出了美国作为许多国家人民的熔炉这个概念。(译者注)

欧洲大陆与新世界的区别，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民问道：“那么，美国人——这个新的人种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或是欧洲人，或是欧洲人的后裔，因此，他们是你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找不到的混血人。”

“当他被接纳进我们伟大母亲的宽大的怀抱里时，他成为了一个美国人。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总有一天，他们付出的劳动和这些劳动为国家带来的繁荣昌盛将使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里，劳动与回报是成正比的，他付出的劳动越多，得到的回报也越多；这种劳动是建立在自然、自觉的基础上的；难道还需要比这更强的诱惑力吗？以前，他的妻子和儿女向他要一片面包都得不到，现在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并且很乐意帮助父亲去清理那些田地，这些田里种植的作物足以养活他们；这里既没有专制的君主，也没有富有的修道院院长或有权有势的贵族索要他们的收成……美国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他们有一套新的行为准则；因此，他必须考虑新的思想，树立新的观念。经历了被迫失业、卑屈的依赖、极度贫困和无效劳动之后，他现在正从事着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这种劳动将使他得到丰厚的物质回报，这就是一个美国人。”

这是对典型的美国人最初的、也是最明确的描述之一，并值得做更细致的分析。根据这位法国皈依者所讲述的，美国人是从欧洲移民过来的人，或是这些移民的子孙后代，他们期望在新世界能够充分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这表明在欧洲大陆普通人是无法独立的，他们无法过上富裕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也表明新世界能够向人们提供大量的经济机遇，人们在新世界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居住在美国的多数都是欧洲人，因为他们期望在这个国家能够轻松地赚到更多的钱。对欧洲移民而言——也就是对那些因为美国生活的优越条件而主动转变成为美国人的外国人而言，美国的希望主要在于其自身提供的经济独立和经济繁荣的机遇。除非这些欧洲人能够摆脱贫穷的困扰，否则，无论他们期望在美国拥有的美好未来会是何种情形，这些皈依者都会认为自己是上当受骗了。

如今人们头脑中对美国生活和美国生活的希望的概念与1780年人们头脑中的概念一样具有活力。毫无疑问,这种表达方式在经历了四代人的民主政治独立斗争后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扩大和发展,而不是彻底地改头换面。与那些外来移民一样,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和在美国生活的其他国家的移民将迎来美好的未来,他们认为未来经济将更加繁荣,人们将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这种对美好未来的渴求从未改变,丝毫没有减弱。由于信仰基督教,他们对国家理念的理解是彻头彻尾的物质的。他们不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孙后代在这个世界上过着永无止境的贫穷生活,期望祝福能够使他们摆脱贫穷。对人口数量日渐增多的多数虔诚的美国人而言,希望是指能够拥有繁荣的经济、舒适的生活希望。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他们渐渐相信,他们对繁荣的需求大大超过了社会经济工厂所能生产并满足人们需求的能力。那些已经富裕起来并过上安逸生活的人们,和那些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更大社会范围内分配这些财富是十分困难的人们逐渐开始接受这种观念——贫困是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然而,美国几乎至今也没有这种传统的欧洲观念,即使在富人群体和生活安逸的人群中也没有这种观念。人们持有的一种普遍的观念仍然是美国人注定是要享受的,而不是放弃这些财富。

需要补充的是,在美国人看来,经济的独立与繁荣总是与自由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这位“美国农民”认为,欧洲移民之所以能够在美国获取大量财富,不仅是因为拥有大量的经济机遇,而且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贵为统治阶级的修道院院长和贵族没有优先索取大份额农产品的权力。这位“美国农民”没有将民主之名与美国改善了的政治、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而当大不列颠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并最终导致独立革命战争爆发时,这位已改变信仰的“美国农民”对暴力促使产生的“新美国主义”感到极为苦恼。不过,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更多的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使移民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受益;而且,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明智地选择转变信仰,开始信奉美国主义。特别是在早

期,他们中有一些人来到美国更多是为了躲避欧洲的政治迫害与宗教迫害,而不是为了赚钱。传统上,美国不仅一直被视作一块提供大量经济机遇并可平等拥有这些机遇的土地,而且还被视为受压迫者和受迫害者的避难之地。不论是在欧洲闹饥荒的年代,还是在爆发政治革命、实施政治迫害的年代,移民船上总是挤得满满的。

然而,自我们国家独立以来,美国的希望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继殖民地居民成功地获得解放,摆脱了对大不列颠的政治依附后,他们又面临着组建一个稳定而有效运作的政府的重任,而且绝不能侵犯自由,甚至在那时自由就已经与美国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它的实现需要运用其他政治原则而不只是自由。或许,担负着这项伟大任务的人们不会完全坦率地承认,他们执行的这项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政治任务将对传统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些影响将对美国观念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实际上,这种观念不再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而被赋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政治内涵和社会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自由之乡变成了平等之乡。这种特殊的美国政治体制是民主的,即使不是不可调和的,至少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农民在《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中就预言了美国建设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并声称美国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将因此发生新的变化;在美国人看来,这种民主政治体制的成功确立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民主体制已经成为经济繁荣、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果多数善良的美国人生活得并不富裕,那么完全有理由质疑我们的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美国人的民主观念越强,他们对“希望之乡”这个构想就会越来越不满足,认为这只不过是自由制度保障下实现的一种普遍的经济繁荣。外国人和未来的美国人所希望实现的进步和提高包括道德和社会两个方面。其含义是而且仍将是,令美国人能够过上一种更加舒心的、羁绊很少的生活,这样他们将构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他们将成为一个令人羡慕的群体。美国制度对美国公民持有的信心就相当于一个真诚地相

信人性的美好的信念。在我们这块幸运的土地上,政治自由与经济机遇通过教育的方式逐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进步。在欧洲,人们无法拥有平等的机遇。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经济发展速度无法与人口增长速度相适应,而且机遇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垄断在特权阶层的手中。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取决于人们一直处于经济和政治奴役的状态下。这样,个人利益就与社会安定和社会福利产生了分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特权阶层要求这种不公正的制度一直延续下去。人民出于自身利益则要求革命性地颠覆这种制度。如果不发动革命,他们就没有充分的动机寻求得到物质上的改善和精神上的提高。有这样一种看法,不相信人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而且认为只有采取最严厉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约束措施才能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被宣称和接受为解释人民受压迫体制的一个合理的理由。美国民主及其实践的理论欧洲的这种理论是相悖的。人民应得到信任,而不是受到怀疑和束缚。他们应通过个人利益这根坚实的纽带将自己与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机会,人性的美德将解决余下的问题。如果任何人都没有特权,那么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就是一致的。这样,美国制度自身的充分与合理性就注定其将取得成功,这种成功将迈出实现人类进步的一大步。正因为我们的制度实质上彻底考验了人性对一个平等机遇作出回应的能力,所以,就经历这个问题而言,其意义远不止具有重要的国家意义。美国体制代表着人类经历过的美好生活的最高期望——人类不必受到束缚就能取得进步,甚至不需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能被救赎。

这就是美国体制本身提出的主张和要求。在某种范围内,该体制运作得很好。美国人过上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裕、充实的生活;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总的来说,他们借助自由与繁荣使个人与社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可以肯定,普通的美国化了的美国人并不比普通的欧洲人更聪明、明智,或出色,但美国人精力更充沛,对未来寄予更多的希望。举例来说,在一百万名美国人中,不论职业,不论条件,与同等数量、同等条件的欧洲人相比,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过着积极

的有意义的生活。在一个既定的社会范围内,灾难事件的数量更少,而实现的有益的成就和功绩则更多。美国人十分清楚和肯定自己的个人需求,而且他们对满足这些需求充满了信心。简而言之,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更加积极和主动,所以他们必需被给予与这种生活态度相对应的道德利益与社会利益。

虽然人们充沛的精力与一个新国家提供大量的农业与工业机遇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也并不完全源于这些有利条件。毫无疑问,廉价的、肥沃的土地不断地为人们提供了定居之便。这些广袤的土地不仅成就了美国的繁荣,而且也是形成美国特性与美国体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许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弊端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源于某些重要的经济机遇被逐步垄断。不论怎样,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拥有更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这些机遇永远都不可能如此迅速转化成大量实际的经济利益。一个特权阶层并非仅仅依靠合法的手段就能确保自己享受特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实施一系列社会禁令剥夺了“地位低下的阶层”利用机会的资格。劈柴人很容易就能被说服劈柴是他的职业。而在 J. M. 巴里先生^①的剧本《可敬佩的克赖顿》中,生活的悲剧不是因为法律不允许他在英国改变自己的信仰转而信奉一个真正的首领,而是因为在美国的土地上,从内心深处他并不渴望实现这种精神上的升华和区别。他对英国生活方式的执著使他自我满足于受奴役而又专横的仆役长的地位。另一方面,一个美国人对美国观念的执著会使这个人变得雄心勃勃,并充

① J. M. 巴里 (Sir James Matthew, Baronet Barrie, 简称 J. M. Barrie, 1860—1937), 出生于苏格兰, 英国戏剧家、小说家、儿童剧作家, 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891 年写出长篇小说《小牧师》, 畅销一时。他还写了独幕讽刺剧《易卜生的灵魂》。1897 年他将《小牧师》搬上舞台, 获得成功, 从此潜心于戏剧创作。1902 年《可敬佩的克赖顿》在伦敦上演, 他逐渐成为有影响的剧作家。此后到 1920 年他几乎每年推出一部剧作。其中较重要的有《彼得·潘》(1904)、《亲爱的布鲁特斯》(1917) 等。《可敬佩的克赖顿》(The Admirable Crichton) 创作于 1902 年, 后经改编于 1957 年拍摄成电影。剧本描写仆役长克赖顿 (Crichton) 与其主人劳埃莫 (Leams) 之间一段有趣的故事。劳埃莫出海游玩, 船只失事, 被困于荒岛上, 在这个特殊境地, 人们相互间原有的尊卑关系不复存在。仆役长克赖顿此时大显身手, 成为这个小天地的主宰, 并赢得了劳埃莫女儿的爱情。正当他们要举行婚礼时, 营救的船只到了。回到英国, 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只有克赖顿一人例外。该剧把离奇的想象与社会批评融合在一起, 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技巧。(译者注)